

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與半世紀浮沉

劉阿榮*

摘要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思想家與革命者，他除了倡導革命、建立中華民國；還留下一套思想體系，作為國家建設的藍圖。以歷史發展與政治社會變遷觀察，大致可分為其生涯發展（1866-1925年）的思想演變，以及他逝世後有關「孫學研究」的變化。本文所謂「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是從孫中山逝世後迄今（1925-2022年），近一百年的「孫學研究」，從過去獨尊的「黨國意識形態」，到逐漸式微；進一步思索兩岸未來必須尋求交疊共識、承先啟後的遠景體系，中山思想具有重要價值。

至於本文後半部分論述「孫學研究的半世紀浮沉」，是指政府遷臺迄今半個多世紀，孫學研究由盛而衰的浮沉。本文探討了孫學研究的兩波高潮：1965年「國父百年誕辰紀念」；1970年代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機構及出版刊物。之後因威權轉型的民主化歷程，孫學研究逐漸衰退。本文研究發現：從孫學研究三大系統的變遷，歸納出孫學研究盛衰起伏的主觀、客觀因素或內在、外在原因。包括：（一）意識形態的黃昏與文化霸權式微；（二）黨國勢力的衰退與政黨輪替；（三）知識僵固與缺乏創新。最後，提出轉型與出路的建議。

關鍵詞：孫學研究、意識形態、國父百年誕辰紀念、三民主義研究所

投稿日：民國 111 年 3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民國 111 年 4 月 29 日

*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兼任教授



壹、引言

對近代中國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甚多，能建立事功且留下一套思想體系者，孫中山先生（1866-1925）無疑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不論從他領導革命，推翻滿清統治，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或由其著書立說，宣傳三民主義，設計救國建國的藍圖……觀之，確實為近百餘年來中國乃至世界的重要思想家與革命家。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頗具代表性的學者曾說：「孫先生是中國近代一個大政治家，實行革命家；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上占重要的地位」¹；後來更進一步說：「他不僅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在近代世界史上也占重要的地位，從思想史來看也是一樣²。」誠然，孫先生為思想家、革命家為國人和世人所肯認。另外，如吳相湘（1984）《孫逸仙先生傳》（上、下冊）；洪墩謨主編（1993）《外國學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論文目錄索引及摘要》……，分別引述許多中、外學者對中山思想的肯定，可見孫學不僅在國內受到重視，也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地位。

孫中山領導創建的中華民國，雖經戰亂分合，迄今一百一十一年仍屹立於世上。而其思想體系所揭示的原理或精神，深刻地影響兩岸之族國、政治與經濟社會發展。

以歷史發展與政治社會變遷加以審視，大致可將孫中山思想分為他在世時（1866-1925）的發展；及其逝世後的孫學研究之變化。前者（孫中山思想的發展）一般可以分別就早期、中期、晚期思想的變化加以觀察，吾人從《國父全集》所編列的各年代及其內容，得以窺知其梗概。而崔書琴（1992）所著《三民主義新論》一書〔1945年重慶初版〕，分別對民族主義的初期、中期、晚期發展（第一章）與民族主義的最後理想（第八章）；民權主義的歷史發展³；民生主義的發展（第十八章）這些發展脈絡有相當扼要地敘述，很值得參照《國父全集》一併解讀。至於孫中山逝世後迄今（1925-2022），將近一百年的「孫學研究」，吾人將以「百年思索與半世紀浮沉」來論述。

¹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人文書店印行，1936年），頁93。

² 郭湛波，《近代中國思想史》（正、補合梓），（香港：龍門書店再版，1973年），頁137。

³ 崔書琴，〈新論補篇〉《三民主義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三次修訂版第二十二次印刷，頁7-8。

本文所謂「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主要是從孫中山逝世後，他的思想經歷許多學者闡述，或由政治人物談論援引，例如蔣中正一直以孫先生革命志業的繼承者自居，他一生中也確實講述過：《國父遺教概要》（總理遺教六講）、《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三民主義的本質〉以及《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等。毛澤東也評價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共在「十一」國慶時，還在天安門城樓掛著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共兩黨」，雖因信奉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差異，曾對立鬥爭了近一百年，但共產黨早期部分領導人也曾加入國民黨接受孫中山思想，而民生主義性質上也與社會主義有相近之處，尤其近年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擷取許多中山思想，可見兩岸皆尊崇孫中山先生，此一現象確實值得思索。

其次，本文所謂〈孫學研究的半世紀浮沉〉，是指政府遷台迄今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國民黨以「革命民主政黨」自居，實施威權統治，強調奉行孫中山思想，因而中山思想取得優勢地位，被稱為「黨國意識形態」，相對地，孫學研究也受到政策加持，曾有兩波高潮。迨及 19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威權轉型與政黨競爭，中山思想及孫學研究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不再具有特殊優勢地位，而逐漸消退式微。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孫學研究由興盛而衰微。相對而言，觀察兩岸的發展，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競爭優勢也與之浮沉，似乎有某些巧合，也是值得關注與檢討的。

就此論文題目觀之，研究方法除可採質性研究方式文獻分析之外，亦可邀請對此議題有相當了解的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深度訪談；或邀集若干學者專家，擬定議題而「焦點座談」。當然，也可採量化研究方法，蒐集孫學研究之論文，經由統計分析，得出作者群、論文題目、論文專書或期刊數量，在不同年份之變化，以觀察孫學研究的盛衰浮沉趨勢。然而，以現有的人力、物力，本文實難以運用質性或量化研究。因此，僅能以傳統的文獻分析或內容分析方法，蒐集各時期重要的相關文獻加以論述。（即使如此，相關文獻也難周全。尤其許多早期資料，目前已經不易看到，筆者雖保有一些，肯定仍有不足。另外，也從網站上找尋查證，匡補缺遺）。然後以歷史發展脈絡，析論孫學研究之盛衰浮沉、歸因與轉型。全文共分為五節：引言、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孫學研究的浮



沉、孫學研究之衰退與歸因、轉型與出路（代結論）。茲分述如下：

貳、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

孫中山一生革命，以救國、建國為主要志業，而他逝世後留下了一套思想體系，對於建設中華民國是相當珍貴的遺產與方針。不過，他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其思想言論散見於各類演講、專著、談話……之中。1925年孫先生逝世後，他的追隨者、同志、信徒，試圖將其思想體系加以整理、宣揚，甚至作為國家發展的藍圖。其中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論述，不僅整理、建構孫學體系的精義，而且思索著其後百年國家發展的基本方向。

本節先提出「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有幾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承先啟後**，從 1925 年孫中山逝世，到 1949 年中國大陸淪為共產黨統治，此時期實為中國近代戰亂蔓延、民族危亡、民生凋敝、國家動盪之時代，設若能依據孫中山思想所強調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反對帝國主義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經由軍政、訓政而制憲行憲；改善民生經濟……，使民族得以存續，國家獲得發展。如此，則孫學研究將具有承先（繼承孫中山遺志）啟後（開啟政府遷台後國家治理及孫學研究）的重要意義。**第二、交疊共識**，雖然中共政權主要師承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而中華民國憲法是「依據孫中山先生之遺教，基於三民主義」而制定並行憲。兩者（兩岸）政經體制確有相當差異，不過也存在交集共識，兩岸都尊崇孫中山先生，也不同程度的實踐中山思想：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即以「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為目標；而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許多交通建設、民族自信心恢復，乃至近年來「一帶一路」的倡議，頗多與孫中山思想不謀而合。尤其近年來大陸學術界對孫學的整理研究，實不亞於臺灣，只是臺灣孫學研究比較重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大陸學界研究孫學則以史學、史料見長，兩岸可以暫時放下意識形態的歧見，交流互補，以產生交疊共識。**第三、遠景體系**，孫中山思想具有遠景體系和實踐方略，他自革命初期即有一個「思想體系」、「價值體系」，作為革命志業的依據，直到晚年還檢視其「實踐體系」的成敗得失。他在 1923 年的〈中國革命史〉說：「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革命事業，千頭萬緒，不可殫述。」上述引文概括言之，

他的革命主義是「三民主義」，革命方略與進程是由軍政、訓政而憲政；更以建國方略（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畫）及建國大綱，作為建設國家的藍圖，最後希望達成「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目標。由此可見，孫學的遠景體系和實踐體系，確實可做為百年國家發展的指導方針，當然值得思索與探討。

基於以上因素，本節將扼要歸納 1925 至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的孫學研究情況，既可理解當時的治理軌跡，尚可延伸至遷台後孫學研究的時代背景：

一、中山思想成為官方思想主流（官定的意識形態）

孫中山晚年，中國仍處於外則列強虎視、帝國主義侵凌，內則軍閥割據、地區混戰的局面。李劍農描述了「北方各軍閥的大混戰與執政政府的消滅」⁴，接著論及孫中山逝世前後南方陣營的整合與北伐。當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完成某種形式的統一後，宣稱要實踐國父遺教，進入「訓政時期」。

民國十八年(1929)，國民政府公布教育宗旨為：「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國家教育宗旨很明顯的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納入其間，並以「促進世界大同」為遠大理想。除了前述「教育宗旨」之外，還附有「實施方針」，一方面作為教育宗旨的注釋，一方面則規定教育實施的準則。其內容包括八項，也都與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思想有關⁵。其後，政府又將中學公民課程「修身」改為「黨義」。如此中山思想（三民主義）成為當時政府施政的方針、制憲的依據、教育的宗旨……，亦即官方的思想主流或「官定的意識形態」。

二、孫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⁴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十版，1974年），頁662-677。

⁵ 伍振鶯，〈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教育大辭書》，2000年，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資訊網，<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2562/?index=9>，引用日期：2022.03.06。



關於 1949 年以前大陸時期的孫學研究，因戰火離亂，大都失散難尋，有些僅能從書目索引、史料目錄中，窺見若干早期文獻。四十年前筆者曾搜尋一些大陸時期的孫學研究資料⁶，分為：北伐統一時期、十年黃金建國時期、抗戰戡亂時期，並就各期代表性的著作略加論述。在該文中曾引述早期學者之著作，對於了解當時孫學研究的概況或有助益。本文在此僅擇四項代表性著作略加敘述：

1、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1925）

孫中山逝世後，戴季陶作為他的同志和信徒，有感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積極整理孫中山遺教，進行研究或詮釋，以凝聚黨員和國人之共識，並提供國家建設的方針。1925 年 6 月（孫中山逝世三個月）戴季陶即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一文），認為「三民主義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他將孫中山重要著作如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加以綜合，而提出「民生哲學系統表」來做總括。並試圖建立「民生哲學」的體系。該書指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⁷」。戴氏也許未必完全掌握孫學的要義，其詮釋也難免帶有主觀，但他最早提出民生哲學或民生史觀，是頗有創建的，也是孫中山逝世後探討三民主義最早、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且直接影響到蔣中正對孫學的闡發。

2、胡漢民《三民主義的連環性》（1928）

胡漢民孫中山重要的革命夥伴，稱得上是孫的左膀右臂。他在 1928 年 2 月提出《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是很有創見的著作。他首先揭示了世界反革命的三大勢力：軍國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而三民主義就是打破這些反革命勢力，他說：「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看出兩個要點：（一）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爭生存為中心的；（二）由爭生存這個中心分演出……民族同民族爭，國同國

⁶ 劉阿榮，〈近六十年來三民主義學術研究之時代取向〉，《中山學術論叢》，第四期，（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年），頁 235-248。

⁷ 戴季陶（1925），《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出版）。

爭，國內人民同君主爭，勞動家同資本家爭的種種現象和事實。」這些複雜紛爭的問題，不是孤立自存而是相關聯的。要解決複雜且關聯的問題，必須從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著手，他說：「三民主義為什麼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為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不會變為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具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⁸。」胡漢民對世局的宏觀性，與強調三民主義的整體連環性，確實有創見與價值。

3、綜論性、體系化的孫學研究

如果前述戴季陶、胡漢民的開創性視野，闡述了孫學的基本價值，則後繼者以綜論性、實踐性、體系化來詮釋孫學，也值得吾人關注。暫且不論其政治立場或政治地位（例如周佛海後來參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蔣中正逐漸成為軍事政治強人），只要是從學術觀點闡釋孫學，實不必偏廢。

周佛海（1928）在胡漢民提出《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之後一個月（1928年3月）出版了《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⁹，單從書名即可發現它是綜述性、體系化的著作，該書首先介紹三民主義的意義、時代背景、演進過程，進而分別就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意涵敘述，並與其他思想做比較，對孫學體系有了基本輪廓。本書曾是黃埔軍校的課程教材，對黃埔軍校全體學生影響甚大，其內容頗受重視。

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推進，至1929年大抵完成國家形式上的統一，接著要進行國家的建設。為訓練幹部、鼓舞民心，蔣中正曾先後發表：〈國父遺教概要〉（原名〈總理遺教六講〉）¹⁰，並以「總理遺教體系表」，分別

⁸ 胡漢民（1928），《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臺北：帕米爾書店〔1968〕，八版）。

⁹ 周佛海，《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1928年）。本文引用的是在臺北的影印版，出版的時間及出版社不詳。

¹⁰ 蔣中正，〈國父遺教概要〉（原名〈總理遺教六講〉）（1935，〔1974〕），引自《蔣總統集第一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1974〕），四版。



將主義、方略、目的示意之，並提出心理、物質、社會、政治四大建設。其後在抗戰期間的「寇深國危」、「寇機轟炸重慶」之際，蔣中正講述〈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程序〉¹¹，分為三民主義原理、主義、革命原動力、革命方略、實施程序、目的等六個項目，最後並以一張「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程序表」來呈現，其中已將前述「四大建設」加上倫理建設，合為「五大建設」。持平而論，蔣中正對孫學闡釋的這兩篇文獻（及其圖表），雖然未必是他親自所創（也許是出自幕僚？）但以他當時的地位，對孫學做此闡釋，當然有重要的影響，並且持續到政府遷台以後。

類似的綜合體系研究，還有胡秋原（1941）：《國家之原理：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行》（重慶：祖國出版社出版）；羅剛（1942）：《三民主義的體系與原理》〔1959〕；劉炳黎（1943）：《國父思想體系述要》（重慶獨立出版社）；崔書琴（1945）：《三民主義新論》（重慶，初版），這些作者或出版品，有些在政府遷後還修訂再版，對於臺灣早期的孫學研究仍深具影響。

4、專論性、學科化的孫學研究

有別於前一類（綜論性、體系化）的孫學研究，當時也有學者以其專業學科為基礎，並與中山思想加以結合比觀，因而出現專論性、學科化的研究孫學專書。而稱為三民主義（或國父）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學……等。就筆者所蒐集到的文獻有：范錡（1929）：《三民主義教育原理》；薩孟武（1929）：《三民主義政治學》；袁業裕（1936）：《民族主義原論》；姜琦（1941）：《三民主義哲學》；呂調陽（1941）：《民生主義經濟學》；崔載陽（1944）：《三民主義哲學》；王集叢（1943）：《三民主義文學論》；王萬鍾（1944）：《孫文學說疏證》；林桂圃（1947）：《國父政治思想體系》（共五冊）。例如：薩孟武的《三民主義政治學》，分別探討三民主義的國家論與政府組織；呂調陽的《民生主義經濟學》，則以經濟學的生產、消費、交易、分配各方面去論述三民主義。吾人實不宜以現在的學術思潮，論述方式，去評論當時的學科化或專論性之孫學著作，而必須立於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去檢視，方能公正客觀，並發現其

¹¹ 蔣中正，〈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程序〉（1939），引自《蔣總統集第一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1974〕，四版）。

學術價值。

三、大陸時期孫學研究的思索（評論與反思）

對於孫中山思想的評價，會隨著時空環境和政治社會條件而變化，因此有稱讚他的思想是「博大精深」；但也有認為他綜合中外學說是一種「大雜燴」。不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他充滿理想性格與不懈的精神，因此，要如何將其思想歸納整理，並實踐力行，就成為後繼的孫學研究及革命實踐者重要的任務。以 1925 至 1949 年之間大陸時期的孫學研究，吾人可以發現：大抵將孫中山思想的內涵不斷充實、思想體系逐漸確立，更重要的是由此思想產生了「信仰」和「力量」：例如北伐成功，使中國由分裂割據而統一；對抗日本侵略與列強壓迫；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處在國族危亡、風雨如晦之際，孫中山思想與孫學研究，鼓舞當時國人「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至少起了一些作用！吾人觀察、對比近二十多年來，臺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幾經政黨輪替，社會價值混亂、國家治理失焦，整體競爭優勢弱化，當與認同分歧、思想混亂有密切關係，因此，當前臺灣亟待凝聚共識之思想；建設國家的藍圖，中山思想正符合所需而益顯其價值。何以當前臺灣承平時代之而弱化？對照當時大陸北伐抗戰能自強！中山思想具有凝聚共識、集中力量的功能。至於政府在大陸失敗而退守臺灣，與其說實行三民主義而失敗，毋寧是未能實踐孫文理想而失民心。因此，孫學研究，確實值得重新評價之，實踐之。

參、半世紀以來臺灣孫學研究的浮沉

延續前一節大陸時期孫學研究的論述，繼續探討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孫學研究的概況（限於篇幅及人力，本文未涉及近年來大陸孫學研究情況）。一方面，國共戰爭國民黨雖然失敗撤退來台，但它的主義信仰並未改變，仍以正統自居，堅持中華民國憲法所訂的憲政體制（法統），而此憲法正是基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國民黨認為對抗共產黨最重要的是「思想武器」，是以三民主義對抗共產主義。因而政府遷台後對孫中山思想的重視與孫學研究，不但沒有消弱，反而更為增強。

其次，本文所謂「孫學研究的浮沉」，包含兩重意義。第一、就字面



意義觀之，「浮沉」意味著盛衰起伏的現象。曹植的〈七哀詩〉有云：「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此詩表面上描寫思婦被夫君遺棄的哀怨，實際上暗喻曹植自己被兄長曹丕疏遠排斥的鬱抑，兄弟「浮沉異勢」，預示了曹子建雖有文采和才華，但曹操過世後曹丕繼位，曹植失去父親政治力支持，終究要沒落下沉，此寓含了孫學雖稱體大思精，但失去政治勢力的庇蔭，終究逐漸消沉。第二層意義是：宋代朱熹「理學」派和陸九淵「心學」派之間的分歧，他們的共同友人呂祖謙（東萊）為調和兩人的觀點「會歸於一」，於 1175 年（南宋淳熙二年）在江西省上饒的鵝湖，舉行著名的「鵝湖之會」。朱熹強調「格物致知」，窮盡事物之理，因此主張「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而陸九淵從「心即理」出發，提出明心見性，標榜「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¹²。基於此檢視過去孫學研究，致力於知識體系與實踐方略的充實，然而當代的孫學研究，有些卻流於支離末節，如果照陸九淵的看法（支離事業竟浮沉），當代孫學研究的浮沉，確實有些相似？

有關政府遷臺之後的孫學研究，筆者過去曾分別以「歷史觀照」和「實理觀照」兩個面向論述¹³，前者（歷史觀照）指出：「一、孫學研究的歷史分期；二、民國六〇年代以前的體系建立時期；三、民國六〇、七〇年代的學術匯通時期；四、民國八〇年代以降的轉型衰退期。」而後者（實理觀照）則包括：「一、孫學研究由學院主導轉入社教主導；二、孫學研究在國內政黨中的現況；三、孫學研究在大陸的興起。」該文發表迄今又歷經二十年，國內、外環境有不少變化如：政治上經歷兩次政黨輪替（2008 年及 2016 年）；經濟上新興（科技）產業改變了經濟結構，財富集中與分配不均日益明顯；社會上則認同分歧加劇且世代對立深化；兩岸力量的消長與彼此關係的緊張、國際形勢的危疑不安……這些新格局、新挑戰都很值得重視！本文鑒於世局變化而思考孫學研究的浮沉，既融合了筆者過去相關研究的觀點，也反映新的世局變化，嘗試以新的思路與論述主軸，來

¹² 維基百科 (2022a),〈鵝湖之會〉, 引用日期 2022.03.06。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5%9D%E6%B9%96%E4%B9%8B%E6%9C%83>。

¹³ 劉阿榮,〈近三十年來國內孫學研究之變遷〉,《國立國父紀念館三十週年館慶特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2年),頁90-101



闡明孫學研究的軌跡，茲分為**基本趨向**、**兩波高潮**加以說明。

一、**基本趨向：政府遷臺以來孫學研究由盛而衰的趨向**

1949 年政府臺灣，當時百廢待舉，亟須建設足以安頓民心、穩定家國，甚至「反攻大陸」的基地。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清除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的影響；另一方面，還要尋求一種建設「復興基地」的治國方針，進而對抗大陸共產政權的「思想武器」。作為黨國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國父遺教、中山思想），就取得了優勢地位，扮演重要角色。1950-90 年代，延續大陸時期以來的教育政策，規定高中三民主義、大學國父思想為學校教育的課程之一，甚至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三民主義」科是高中考大學的考科之一（有些研究所也把國父思想作為入學考試的科目）。此外，黨政軍重要幹部講習訓練課程，也安排與孫學有關的資料研讀或討論……。如此的政治社會氛圍與教育體制，孫學研究實可謂盛極一時。但強制性地將「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作為高中和大學的必修課程，以及升大學和公務人員資格考試的考科，容易使孫學研究僵化、教條化，將會遭致學生與社會之反感，也埋下日後衰退的因子，本文稍後將述及。

1980 年末，臺灣政治發展由威權體制邁向威權轉型，獨占或優勢政黨轉化為競爭型政黨，於是原依恃統治者的黨國意識形態也將隨之退式微。孫中山思想與孫學研究的情況正是如此，1988 年蔣經國總統逝世，李登輝由副總統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也兼中國國民黨主席），但他認為中華民國政府遷來臺灣是「外來政權」，也不認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文化，甚至他更傾向於協助當時的反對黨（民進黨），根據他的表白「李登輝非常自豪，政權能夠和平轉移對於臺灣民主發展歷程是很重要的一個結果，它結束了『父傳子、做到死』的權力傳承模式¹⁴。」陳水扁也說李登輝「多次與阿扁會晤，提示要項，傳承經驗，用心至誠，期待更深。……登輝先生無疑發揮了最重要的護衛作用¹⁵。」吾人可以理解，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對民進黨的眷顧（曾擔任民進黨主席的黃信介曾說，李登輝是國民黨加上

¹⁴ 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1 年，初版 100 刷），頁 167。

¹⁵ 陳水扁（2001），〈人民的力量勢不可擋〉，編入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所寫的序，（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1 年，初版 100 刷），頁 34。



民進黨的「一個半黨主席」)，李登輝這種態度，顯示對孫中山思想和孫學研究非常冷漠，孫學研究由盛而衰的趨勢相當明顯。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他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孫學研究當然不會重視。2008 年再次政黨更迭，國民黨的馬英九當選總統，雖然對孫中山思想比較尊崇，但也著墨不深，孫學研究持續衰退式微。2016 年又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的蔡英文執政，其抗拒中國而傾向台獨，進而排斥與中國或中華有關的思想文化，孫學研究每況愈下的困境自不待言。綜括言之，政府遷台以來孫學研究由盛而衰的趨向，是相當明顯的事實。

二、兩波高潮：臺灣孫學研究的兩個高峰階段

雖然政府遷臺初期相當重視孫學研究，有些在大陸時期出版的著作，如前述戴季陶、胡漢民、蔣中正之代表作都普遍流行，其他學者諸如羅剛：《三民主義的體系與原理》¹⁶、崔書琴：《三民主義新論》¹⁷……等名著專書，在臺灣都重印出版（新標示臺灣第幾版），作為研究教學上的重要書籍和文獻。不過，特別值得關注的是，1960 及 70 年代有兩波孫學研究高潮，在「量」和「質」方面都頗為亮麗充實。第一波是 1965（民國 54）年「國父百年誕辰紀念」；第二波是 1969（民國 58）年中國國民黨十全大會提出「重建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新中國」，暨 1976（民國 65）年「十一全大會」通過之中心議案：「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決議在幾所著名的大學設立「三民主義（或中山學術）研究所」，開啟了「孫學研究」和人文學、社會科學的匯通整合階段。茲簡述這兩波高潮之梗概：

（一）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與孫學研究的第一次高峰

孫中山誕生於 1866 年，至 1965 年為百年誕辰紀念，政府與各學術團體均有重要的紀念儀式或活動，例如：籌建國父紀念館、陽明山中山樓落成、臺北故宮博物院定名為「中山博物院」……等。而與孫學研究出版最直接關係的有以下各項（按：僅為筆者所知或所擁有，難免有重要文獻遺

¹⁶ 羅剛，《三民主義的體系與原理》，（中央政治學校出版，1942 年）。本文引用〔1959〕台三版。

¹⁷ 崔書琴，《三民主義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三次修訂版第二十二次印刷，1992 年）。

漏)，本文除引用筆者早期所列資料¹⁸，也增補、修正若干新文獻：

1.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的書籍二十餘冊：
《國父全集》三冊（若干年後增為 6 冊，之後再增為 12 冊）；《革命先
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三冊；《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六冊；
《國父思想論文集》五冊（以上三種文集大多收集在此之前的重要文
獻彙編，也有若干新作）；《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國父年譜》二冊……
這些文獻不僅蔚為大觀，對當時的孫學研究也頗有助益。
2. 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出版《中山學術文化集刊》三十多集：
1965 國父誕辰紀念日，各界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及闡揚中
山思想學說，獎助學術研究而成立了「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管
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是
國內極具規模的學術文化基金會。在 1968 年至 1985 年共出版了三十二
集《中山學術文化集刊》，此一集刊的論文大都為當時孫學研究重量
級學者所撰述，堪稱最經典的孫學著作。此外，該基金會也出版《中
山自然科學大辭典》十冊（1973-75 年出版），為重要的工具書（以上
資料參見該基金會網站）。
3. 程天放主編（1965），五位專家論著的《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該書
封面特別印出「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字樣，內容分為五部分（有合輯
為一厚冊，亦有分為五單冊發行），包括謝徵孚著：《從社會學看國父
思想》；孫邦正：《從教育學看國父思想》；桂崇基：《從政治學看國父
思想》；羅時實：《從經濟學看國父思想》；崔載陽：《國父哲學思想體
系》。這些著作為當時紀念叢書之中，論述最專精，最受重視的專書。
4. 三民主義研究所主編，幼獅書店印行《國父百年誕辰叢書》共二十四
冊：該叢書分為第一輯（十二冊）、第二輯（十二冊），包括國父的政治、
經濟、社會、法律……相關思想等，皆為孫學研究之重要著作，
有些還再版多次。
5. 政工幹部學校（後更名政戰學校）編印：《國父百年誕辰紀念特輯》思

¹⁸ 劉阿榮，〈近六十年來三民主義學術研究之時代取向〉，《中山學術論叢》，第四期，（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年），頁 250-251。



想戰叢書二十冊。本叢書與前項性質相近，然作者群及論文方向有些差異，因發行出版單位較為特殊（非一般書局發行），流通較為不易。

6. 國父遺教研究會編印《國父學術思想研究》專書，且定期出版《革命思想》刊物：該研究會大都為大專「國父思想」教授或黨政人士組成，且積極從事孫學研究，後續出版許多與國父遺教有關的著作，而《革命思想》出版了數十卷，各期都有對孫學研究的論述。
7. 文星書店出版與孫中山思想有關的專書多冊：文星書店創辦於 1952 年，原來以發售及影印外語書籍為主，後來出版《文星》雜誌及《文星叢刊》頗為著名，1963 年至 1966 年由李敖擔任主編，對臺灣青年思想產生重要影響¹⁹。雖然該書店的出版對當時政治有不同意見，但在 1965 年國父百年誕辰也出版了《孫文主義論集》、《研究孫中山的史料》、《孫中山民主言論》、《孫中山先生感憶錄》、《孫中山與共產主義》等相關書籍，頗具價值。

國父百年誕辰前後的相關著作，除了上述規模比較大的叢書類編之外，還有許多個人著作非常具有份量，例如：葉青（任卓宣）：《三民主義概論》、任卓宣《三民主義新解》、傅啟學：《三民主義大綱》及《國父遺教概要》、周世輔：《國父思想》及《三民主義的哲學體系》、陶唐：《三民主義綜論》、張益弘：《孫學體系新論》、梁兆康：《三民主義思想體系》、金平歐：《三民主義綜論》及《國父哲學思想》、蔣一安：《國父科學思想》、林桂圃：《民權主義新論》、周開慶：《國父經濟學說》……等，均為當時有關孫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至於由秦孝儀編輯（1965）的《蔣總統對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與融會貫通》一書共八十餘萬字，則是節錄蔣中正對中山學說的各項闡述要義，有特殊意義。

這一波孫學研究大致有幾項特色：**第一**、有些是延續大陸時期來台的再版或新增版。**第二**、叢書編纂是將過去（含大陸時期）一些書籍或文章納入，再加上若干新資料，例如：前述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的書籍；文星書店出版與孫中山思想有關的專書，大都收集

¹⁹ 維基百科(2022b),〈文星書店〉,引用日期:2022.03.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98%9F%E6%9B%B8%E5%BA%97>。

舊作編輯而成，這些文獻的出版，在百年誕辰紀念過後，基本上就結束了，很少再印行。**第三**、研究架構是採綜合統整的「百科全書式」論述，少部分是對孫學某一領域（如哲學、政治、經濟等）的析論。**第四**、研究方法偏重「以經解經」的文獻整理，亦即援引孫中山、蔣中正言論來佐證其論述，較少與當時新的學術理論相結合，即便有些政治、經濟學理，也較為陳舊。**第五**、許多專書是做為當時講授「國父思想」課程的教材之用，也是當年國家考試（高考、普考）的用書。**第六**、在當時兩岸敵對情勢下，孫學研究中少不了以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的文字宣傳；又為了彰顯三民主義的優越性，也出現《三民主義和其他主義的比較研究》，例如任卓宣：《三民主義底比較研究》、王昇：《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的比較研究》，大都先介紹各種主義的要義，再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精義，最後歸結出三民主義比其他主義優越。

（二）國民黨十全、十一全「強化三民主義案」為孫學研究的第二次高峰

1958年3月29日至4月9日，中國國民黨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中正（1969）於揭幕典禮致詞〈革命歷史的啟示和革命責任的貫徹〉說道：「革命成功的條件，一在於有中心思想和信仰，一在於有革命的精神和方法，……今天我們既有三民主義，以為其中心信仰，亦有了革命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以為其工作依據……，我們革命必能成功²⁰。」他特別強調三民主義中心思想。到了1976年的「十一全大會」通過六項中心議案，其中之一便是「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如何加強呢？決議在幾所著名的大學如台大、政大、師大、中山大學設立「三民主義（或中山學術）研究所」，而原來已經設立多年的中國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和政工幹校（政治作戰學校），相關系所也要加強三民主義教育。比較特別的是，當時政府要求各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因此1976年中研院錢思亮院長請陳昭南院士接任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當時的背景與憧憬值得略加敘述，因為影響到國內其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的方向。根據曹添旺（2008）描述，當時費景

²⁰ 蔣中正（1969），〈革命歷史的啟示和革命責任的貫徹〉對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揭幕典禮講詞。（http://www.ccfid.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59:0009-38&Itemid=256，引用日期2022.03.16）



漢院士對陳昭南提議²¹：

以三民主義教條所宣稱的「科學」本質，來研討經濟、政治、社會等相關議題，才不會讓三民所研究落入八股。費院士舉例說明，民生主義的目標為「均富」，而「均」係指所得分配的合理化，「富」則是經濟發展，如此探討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相關議題，就是從事民生主義的研究。三民所的其他學科，也應秉持這樣的科學精神進行研究。三民所的首要任務，因而是延攬優秀研究人才……在他(陳昭南)的堅持與努力之下，中研院三民所成為最不像研究三民主義的學術單位，而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重鎮。

客觀而論，當時學術環境已經有新的發展趨向。1960-70 年代臺灣已有不少從國外學成歸國的學者，主張以新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來研究學術，教學內容也有創新進步。例如。魏鏞(1971)曾撰寫〈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²²。該書亦獨立出版為《臺灣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之一冊，內容討論社會科學的性質、研究對象、發展經過、社會科學的分類及各科的內涵、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並分析社會科學與現代科學的關係。另外，當時高希均主編(1973)《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介紹美國當時流行的各學科發展趨勢，邀請各領域學者將新觀念與新研究途徑介紹到臺灣²³。而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出版的《中央月刊》，也常介紹各類社會及人文科學的知識，並匯集成《淺說現代社會科學》專書²⁴，尤其《中央月刊》曾有若干文章討論三民主義學術化問題。1974 年出版的《中華學報》，開始對「三民主義學術化」與「學術三民主義化」有更多討論，雖然傅啟學認為這兩句話從語意上研究，有相當語病，似乎忽略三民主義本身的學術地位²⁵。不過當時的學術氛圍已經瀰漫著「三民主義與相關學術會通整合」的趨勢，也正是孫學研究第二波高潮的來臨。

²¹ 曹添旺(2008)，〈追憶陳昭南院士〉，載《自由評論網》2008/11/26。(<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61156>，引用日期 2022.03.22)

²² 魏鏞(1971)，〈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編入：《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一冊《社會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1-92。

²³ 高希均主編，《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店初版，1973 年。

²⁴ 中央月刊社，《淺說現代社會科學》，(臺北：中央月刊社出版，1973 年)。

²⁵ 傅啟學，〈科學的三民主義〉，《中山學術論叢》第一期(創刊號)，(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80 年)，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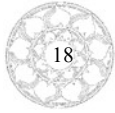
1. 孫學研究的新典範

如果從大陸時期到遷台初期的孫學研究，是建立在「由信仰產生力量，再求理解以融貫」，所以要「以經（以孫、蔣言論）解經」，並建構一套完整圓融的孫學體系（體系建構期），則 1970 年代孫學研究有新典範出現。1970 年代中國國民黨對其中心思想（三民主義）的傳播，已由建立「博大精深」的「孫學體系」典範，朝向「經由理解而起信仰」的新思維。因為當政者意識到：如果孫學研究只停留在一些三民主義學者組成的「學術社群」，相互取暖、孤芳自賞，而不能隨外界學術主流與時俱進，則孫學將失去生機盎然、日新不已的活力²⁶。或者孫中山思想只是政治人物的宣傳口號，無法吸引民眾的興趣，也不會發生信仰、產生力量，對其政權並無助益，必須改革突破。因此，「三民主義學術化」新典範的呼聲，正體現了此一潮流趨勢。孫學研究邁入另一重要階段，筆者以：「學術匯通時期」稱之。此一時期孫學研究與出版，除了前述國民黨所發行的《中央月刊》、《中華學報》或相關報章上偶有討論之外，主要重鎮還是幾所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博、碩士論文及相關學報，及中央研究院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等，這些刊物可視為孫學研究與學術結合的高峰時期，簡介如下：

2. 孫學研究的代表性刊物與著作

(1)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創刊號出版於 1988 年 11 月，為慶祝中央研究院成立 60 週年，由當年的「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前身）發行出版。本集刊收錄範圍涵蓋了哲學、歷史、社會、政治、經濟、心理及法律等相關學術論文。有鑒於學術分工的專門化，雖然可促成各個學科的縱向深度，但也難免於斷喪橫向的擴展，引此本刊致力強化科際整合的工作，力求與各項研究專題相輔相成，並定期出版學術期刊，因稿源不斷增加，由年刊改為半年刊，再增為一年發行四期的季刊，收錄更多優質的學術論文。該集刊

²⁶ 劉阿榮，〈近三十年來國內孫學研究之變遷〉，《國立國父紀念館三十週年館慶特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2 年），頁 93。



迄今仍正常發行，其被高引用次數、高點閱率深受學界重視，不過收錄的孫學研究則來越少²⁷。

(2) 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山學術論叢》。台大三研所創立於 1974 年，至 1980 年創刊《中山學術論叢》，每年發行一期，至 2000 年共 18 期。該所自 2000 年起正式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刊物也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每年出版兩期。筆者對該刊物頗有情感，因創刊之時在師長指導、同學推舉下，筆者忝為創刊號主編，其後在《中山學術論叢》和更名後之《國家發展研究》學報，都曾投稿，也保有全套的論叢，並閱讀其中文章。該刊已通過科技部 2017 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為第三級期刊。(參見台大國發所官網)

(3) 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政治文化》、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之《三民主義學報》、中山大學之《中山社會科學譯粹》。這些研究所大抵為當年十全、十一全大會推動國立大學設立的「三民主義研究所」而成立，培育許多優秀的孫學研究人才。隨著時代環境變化，都已經改名或合併了，其出版的刊物早已停刊。例如：政大的《政治文化》、師大的《三民主義學報》、中山大學之《中山社會科學譯粹》，文化大學於 1962 年(當時為中國文化學院)最早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並發行《學宗》，以上各校之學術刊物，筆者曾擁有全套(中山社會科學譯粹)或其中之若干期，內容大都為闡揚孫學的論著，不過後來均停刊了(不知改名後的各校系所是否仍留存那些刊物？恐怕不易！)

(4) 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相關孫學研究和研討會論文集。國父紀念館是為了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偉大人格及革命行誼，並發揚其思想學說，而於 1964 年開始籌建，1968 年 3 月 12 日正式開工，1972 年 5 月 16 日主要工程完竣，舉行落成典禮。當其竣工啟用後，即重視中山思想的研究與發揚，先後舉辦數十屆與中山思想有關的國際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和專書等²⁸。另外，自 2006 年起更發行《孫學研究》學術刊物，是目前國

²⁷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22)，《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簡介，引用日期：2022.03.23。https://www.rchss.sinica.edu.tw/jssp/page1/super_pages.php?ID=jsspintro。

²⁸ 劉碧蓉，〈臺灣孫學研究之回顧(1990-2015)：兼論國立國父紀念館之角色〉，《孫學研究》，(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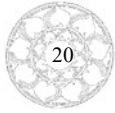
內、外最主要、最受重視的孫學研究刊物，迄今已發行 31 期。而且藉著新科技之便利，建置了「國父全集暨年譜電子書」「三民主義全文檢索系統」、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中山學術資料庫……等（參見國立國父紀念館官網）。該館目前及未來將承擔更重要的孫學研究與發揚角色，本文後面再論述。

(5) 《中央月刊》、《中華學報》與《憲政思潮季刊》對孫學的闡揚。中國國民黨文工會於 1958 年 10 月 31 日出版《中央月刊》革新第一卷第一期（由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內容介紹日常生活與文學等，每期會以故宮文物或一些名畫、照片為封面，內有大陸美景彩色照片，以示不忘故國河山。至 1970 年代有多期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討論三民主義學術化問題，對孫學的學術化與普及化有一定的影響。後來又出版《中華學報》，是一份相當高水準的學術刊物，撰稿者皆為當時非常受重視的學術界菁英，論文內容以各種學術觀點論述中山思想或相關人文社會科學，可惜後來因稿源減少，期刊內容日漸單薄，終至停刊。另外，由國民大會秘書處出版的《憲政思潮季刊》，1968 年「行憲二十八周年」出版第一期，至 1991 年 6 月出版第 94 期後停刊，2001 年 12 月復刊第 1 期，2002 年復刊第 2 期，就完全中止了（可能與國民大會大虛級化有關？）。《憲政思潮季刊》內容主要介紹憲政原理、自由與人權、各國憲法與憲政，是非常重要的憲政研究刊物。1970 年代有數期介紹了政治行為、政治動員、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人格……等行為及社會科學，對國內學術思潮影響甚大。而 1981 年 12 月第 56 期是「三民主義憲政思潮專輯」，除了有國父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蔣中正的三民主義本質，還介紹陳立夫、葛立格（W. F. Grieg）、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秦孝儀、周道濟、朱堅章、華力進、孫震、楊樹藩……等對孫學有研究的中外學者是非常有價值的專輯²⁹。上述三種月刊或學刊，筆者曾努力收集保存至今，而目前坊間已經少見。

(6)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出版與孫學相關的書籍。本文前已述及該基金會是闡揚中山思想學說與獎助學術研究而成立，也是當前極具規模的學

北：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2016 年），第 20 期，頁 17-42。

²⁹ 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憲政思潮季刊》第 56 期，（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出版，1981 年）。



術文化基金會，其出版的《中山學術文化集刊》共三十二集（1968 至 1985 年），正是孫學研究的兩波高峰期，它們躬逢其盛。另外，該基金會與國內、外學術團體舉辦孫學相關研討會，出版專書或論文集，更邀請海內、外學術界人士撰寫專著，輯為《中山叢書》及《中山文庫》100 本、《名著編譯叢書》數十本，其內容除中山思想外，也涉及其他人文、社會、自然及應用科學，有一段時期其還與報社合作，創刊「中山學術論壇」（參見該基金會官網）。

除了上述各研究所或學術團體的定期出版、編輯叢書之外，許多團隊或個人也有不少經典之作。例如：台大心理系出版的《三民主義的心理學》、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三民主義與都市及區域計畫》（辛晚教編著，國立編譯館出版）。而周道濟、孫震、馮滬祥合著的《三民主義研究》（政大公行教育中心編印）是國民黨與政府重要幹部講習材料。

此一時期黨政單位舉辦的相關研討會，並且出版論文集，也頗有可觀者。如：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中央文化工作會、革命實踐研究院等結合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所召開或推動的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1986 年蔣介石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 冊。1991 年中華民國建國 80 年學術討論集多冊，1995 年國父建黨革命 100 週年學術研討論文集，1997 年抗戰勝利 50 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以及中央文化工作會推動的三民主義教學與資料研究中心，對三民主義教育的調查，如：1976 年大專院校三民主義教育成效調查分析等。正中書局所出版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叢書。以及近代中國出版社所出版的與孫中山相關的書籍，這些系列叢書與出版的研討會論文集，當中有探討孫學與近代中國革命的相關論文。

最特別的是周世輔、周陽山父子兩代對孫學的論著與詮釋，周世輔是上一輩孫學研究的佼佼者，其《三民主義的哲學體系》、《國父思想新論》是大學課程與高普考重要的書籍；而周陽山從美國學成歸國任教台大三民所和其他大學，把新的學術思潮和理論融入其父親「數本舊作的合訂修正本」，並以導論、註解、附錄等形式創新，父子兩代共同闡釋中山思想，

一時傳為佳話，書名為《中山思想新詮》³⁰。

3. 孫學研究第二波高潮（學術匯通期）的方法與特色。

第二波孫學研究高峰期筆者稱之為「學術匯通期」，因為用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學理與方法來研究孫學，或將孫中山思想與當代學術思潮匯通整合，其起迄時間並不容易明確劃分，大致興起於 1970 年代「三民主義學術化」氛圍下，幾個大學設立「三民主義（或中山）研究所」，而式微於 1990--2000 年代的各所更名、整併或消失（容後敘述）。此波孫學研究的方法與特色，可以簡單歸納幾點：**第一、研究主題方面**，不再追求宏觀巨視的「博大題旨」，而聚焦於孫中山某一重要理論或學術上新概念而論述開展。**第二、引用學理方面**，由過去偏重孫中山（及蔣中正）思想言論為主，改變為以人文及社會科學為主。**第三、研究方法方面**，改變過去偏於「以經解經」的詮釋方式，而採新式的論文寫作途徑，以現代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的學理來詮釋、分析、修正或強化中山思想的學術論述。**第四、研究人力方面**，除了教授及學者專家，更多碩、博士研究生的投入論文，不過其論文品質差異頗大，良莠不齊。**第五、整體而言**，第二波高峰期孫學研究的「數量」龐大，研究方法較符合學術規範，但著作「品質」相當懸殊。**第六、主要影響**，這一波高峰期培養的許多碩、博士年輕學子，後來成為各大專院校「國父思想」或法政及社會科學課程的教師，也有進入其他各領域服務，對國家認同與社會實踐上大致能符合期待。

肆、孫學研究的衰退與歸因

客觀存在的事實，不因個人意志而轉移，孫學研究由盛而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本文可以從孫學研究三大系統的變遷，觀察孫學研究盛衰起伏，進而歸納若干原因。

一、孫學研究三大系統的變遷

從上一節的敘述中可以發現，孫學研究的第一、第二波高潮雖然所根據的學術典範、研究方法有所變革，其構成的研究團隊也經歷世代傳承遞

³⁰ 周世輔、周陽山，《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臺北：三民書局初版，1990年）。周世輔、周陽山，《中山思想新詮---民權主義與中華民國憲法》，（臺北：三民書局初版，1992年）。



遭，不過這兩波的孫學研究主力，大致都可以歸納為三個系統組成：（一）學術機構與學院系統；（二）黨政軍相關機構；（三）民間團體或基金會。觀察這三個系統的傳承、起伏、變遷，即可理解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孫學研究的浮沉。

（一）學術機構與學院系統

國內孫學研究一直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支持，基於中華民國憲法和教育宗旨，把「三民主義」和「國父思想」，列為高中、大學的必修及考試科目，例如政府規定大專院校，自 1950 年代起，恢復三民主義課程，1964 年更名為「國父思想」，這種黨國優勢，成就了 1950-80 年代孫學的盛事，但隨著威權轉型，解嚴與中止動員戡亂時期的政治社會變遷，國民黨由「革命民主政黨」的一黨獨大，轉化為兩大黨競爭的格局，影響學院系統孫學研究的起伏。例如：中央研究院當年因政府政策而設立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後來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再併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至於幾個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變化更大。

1980 年代末，大學校園出現「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改為選修」的聲音，臺灣大學接受教育部委託研究，提出「大學共同必修課目修訂草案」，建議將「國父思想」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消息傳出後，「國父遺教研究會」、「三民主義教學研究會」和「中國五權憲法學會」等三個團體，聯合發表聲明表示反對，認為改為選修，是「既屬違憲並違反國策」，所以「應請教育當局慎重考慮」³¹。不過，當時有些輿論（屬於中間偏右）直言「真金不怕火煉！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應當容許學生選修」，並引出一段往事，強調要尋找孫學的原創活力，才能吸引年輕人。

民國八年五月，胡適先生在上海拜晤了國父孫先生。後來孫先生過世，他在「現代評論」上談到對國父的印象說：「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後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今之教授三民主義者，燭照全局者少，枝枝節節者多，遂令見樹不見林，

³¹ 張作錦，〈真金不怕火煉！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應當容許學生選修〉，載《遠見雜誌》，1989 年二月號。

失去了三民主義原有的巍峨風貌，對青年人減少了吸引力³²。

至 1990 年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教育部宣布「國父思想」課程更名為「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並於 1993（民國八十二）學年度實施。後來 1995 年大法官釋字 380 號，稱教育部規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部定大學共同必修）違憲，改由各校自訂，於是許多學校把「國父思想」更改名稱，並轉型為「通識課程」。另一方面，高中升大學考試分數六科共 600 分，而「三民主義」科目 100 分（占 1/6），行之有年，至 1990 年代調降為 50 分，之後完全取消考三民主義，甚至課程也終結了。由於大學與高中的國父思想、三民主義改革，最直接影響的是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招生、課程、畢業生就業……等等；間接影響了這些研究所的更改「所名」、課程規劃、師資……等等。

例如：臺大三研所改名「國家發展研究所」（已如前述）；政大三研所創設於 1974 年，至 1994 年更名「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8 年再更名「國家發展研究所」（參見政大國發所官網）。師大三研所創立於 1968 年，於 2003 年更名為「政治學研究所」，再於 2015 學年度併入東亞學系，與孫學已經頗為疏遠（參見台師大東亞系官網）。至於為了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而於高雄復校的中山大學於 1980 年創立「中山學術研究所」，是該校設立的第一個研究所；1993 年中山大學成立大陸研究所。2008 年 8 月 1 日該校將中山學術研究所與大陸研究所整併，並改名為「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研究方向也有所變化（參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官網）。文化大學於 1962 年（當時為中國文化學院）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2009 年 8 月該所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合併，更名為「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2016 年再更名為「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參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官網）。

綜合以上，整個學院系統孫學研究的浮沉，因政策（黨政力量）而蓬勃發展，盛極一時；也因國民黨力量衰退，而紛紛更名、合併甚至消失，也影響了師生的研究、教學與就業……等。筆者不禁感慨：「孫學」作為

³² 張作錦，〈真金不怕火煉！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應當容許學生選修〉，載《遠見雜誌》，1989 年二月號。



顯耀一時的「黨國意識形態」，究竟是政治力量成就其「獨特的官定意識形態」？還是政治力量消退而牽連其「特定意識形態」必將退位？具體而論，凡特殊的際遇，是否也隱含著特殊的命運？如果同樣持此視角觀察，近二、三十年來因特殊政治因素考量而設立的一些學院系所，是否也起於特殊際遇，又隱含著特殊的命運？

（二）黨政軍的相關機構

孫學研究的第二個組成系統可稱之為「黨政軍的相關機構」，例如中國國民黨的「文化工作會」（文工會），極盛之時直接影響到教育文化的發展，也是孫學研究極重要的推手，本文前述《中央月刊》、《中華學報》乃至「中央文物供應社」、「正中書局」……等都與文工會有關。隨著國民黨的式微與改組，這些機構或刊物也弱化或消失。

國軍是國家的軍隊，軍人武德是以「智、信、仁、勇、嚴」來做為軍人之精神修養。但威權時期還強調「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為革命軍人的主要信念；因而，孫中山與蔣中正的思想言論是軍方所重視的。政工幹校（政治作戰學校）有政治系所，軍方有青年戰士報，而黎明書局與軍方關係密切，都是當時的情況，如今情勢也改變了，不復以往的角色與功能。

「國父紀念館」是國父百年誕辰時「為了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偉大人格及革命行誼，並發揚其思想學說」而籌建，也是政府機構中唯一正式的研究、整理、典藏、展出……孫中山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單位，雖然其行政隸屬由教育部而改隸文化部，也經歷國民黨、民進黨的兩次政黨輪替，但該館作為扮演孫學研究主導角色；發揚孫中山思想學說的重鎮，不僅名正言順、責無旁貸，更須擔負孫學研究慧命永續、傳承發揚之重責大任。

（三）民間團體或基金會

遷台初期研究孫學的組織並不多見，殆及 1960 年代國父百年誕辰之際，除了前述兩個系統（學院、黨政機構）之外，也出現了若干相關團體或基金會，較著名的如：「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國父遺教研究會」、「三民主義教學研究會」和「中國五權憲法學會」……這些老字號組織；其後新興的如：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學會（現更名為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中華民國孫文學會、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中華民國

三民主義教育學會、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都扮演著推展孫學研究、兩岸關係、族群與國家發展……的角色，也出版各類書籍或論文集。

這些基金會或學會等團體，其中成員有許多重疊，而且彼此相互支援以增強學術活動力。不過因為組織、經費、人力差別頗大，對孫學研究的力度也有不同。其中成立最早、持續運作、影響最大的厥為「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本文前述兩波孫學高峰期，該基金會都有重要的貢獻，且迄今仍積極推動中山思想的研究與發揚，成果相當豐碩，茲不贅述。特別值得說明的是，該基金會推展孫學是採比較寬廣的視域，不僅重視一般的人文社會科學，還擴及自然及應用科學，因為他們認為中山先生十分重視國家建設，提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實業計畫等，都需要發展科學以實踐之。另外，出版中山先生的世界觀、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中山先生與美國、中山先生與德國、中山先生與法國、中山先生與俄國……等，頗受重視及好評³³。2004年成立的「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成員來自學術界精英，培育二十多位的年輕學者，作為孫學研究的種子隊伍，成了臺灣重要孫學期刊的發表作者群，也關心兩岸社會文化，該中心提供學術研究及交流平台，對今後孫學研究具有相當影響（參見該中心官網）。

二、半世紀以來孫學研究盛衰起伏的歸因

古今中外不論偉大帝國、巨富豪門，由盛而衰，實屬常見。孫學研究的衰退有其主觀、客觀因素或內在、外在原因。簡要歸納如下：（一）意識形態的黃昏與文化霸權式微；（二）黨國勢力的衰退與政黨輪替；（三）知識僵固與缺乏創新。

（一）意識形態的黃昏與文化霸權式微

近代關於意識形態的研究，大抵追溯自法國大革命時期拿破崙攻訐其反對者，而指稱為「意識形態思想家」，但隨後之發展卻把意識形態當做中性詞看待，指的是一種共同的觀念或信仰³⁴，例如歐美民主國家信奉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共產國家強調計劃經濟和社會平均，可謂意識形態

³³ 邵雍（2021），〈評「中山先生與世界」系列叢書〉，《孫學研究》，（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2021年），第31期，頁155-172。

³⁴ 劉阿榮，《三民主義社會變遷理念之建構及其發展》，（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初版）。



壁壘分明時代，有學者稱 1750---1980 年代為「意識形態的時代」³⁵。

然而，隨著世局變化：1989 年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開始轉化，1991 年蘇聯解體，而且 1980-90 年代中共的改革開放.....產生了「非共產世界」或「後共產主義」的時空轉換，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對「意識形態」對立的詬病，也起了質變，例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稱《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貝爾（Daniel Bell）認為《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乃至雷嘉（M.Rejai）（1971）所謂《意識形態的衰退》（*Decline of Ideology*）.....凡此都指向意識形態支配的時代已過去，因此不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三民主義，都逐漸沉默下來，這是國際情勢的變化，也是意識形態的黃昏³⁶。

另外，對於統治者藉由文化霸權將其意識形態灌輸於人民，也常被批評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者之一，義大利共產黨員葛蘭西（A.Gramsci）在《獄中札記》指出：「統治集團通過社會行使的『霸權』職能，另一方面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統治』或管轄職能³⁷。」一般國家不但擁有完整的武力（暴力）強制，例如：軍隊、警察、法庭、官僚機構.....使人民「服從」其統治，更對市民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霸權」支配，以形塑馴服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當代提出對抗這種意識型態霸權支配的方法，就是解構統治者的文化霸權，例如從教科書中減少意識形態的影響與支配³⁸。更進一層言，必須培養成熟的公民社會，理解統治者的意圖所在，非政府組織（NGO）與公民社會合作。誠如學者泰勒（M.Taylor）指出³⁹：一個堅強的非政府部門，必須與公民社會及民主政治的發展，相互連結在一起。

（二）黨國勢力的衰退與政黨輪替

影響孫學研究式微最直接因素，當屬黨國勢力的衰退與政黨輪替。尤

³⁵ 張明貴譯，Frederick M. Watkins & Isaac Kramnick 合著《意識形態的時代：從 1750 到現代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 年）。

³⁶ 劉阿榮，〈近三十年來國內孫學研究之變遷〉，《國立國父紀念館三十週年館慶特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2 年），頁 95-96。

³⁷ 曹雷雨等譯，A.Gramsci 著：《獄中札記》1971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7。

³⁸ 藍順德，《教科書意識形態—歷史回顧與實徵分析》，（臺北：華騰文化公司出版，2010 年）。

³⁹ Taylor, M. (2005).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Reference .

其挾貴得勢或依附於優勢政治力量者，當其優勢不再，必將衝擊共生結構，「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的密切關係，正是「共存共榮」或「共衰式微」的現象。如前所述國民黨遷台後，1950年至1980年代居於獨大優勢，但隨者威權轉型，政黨競爭、輪替，孫學研究亦趨於衰退。事實上國民黨執政時期，若干施政方向也未必實踐中山思想，例如1980年以後貧富差距擴大、90年代黑金政治盛行，皆與孫中山主張「均富理想」、「廉能政治」背道而馳，民眾對國民黨的不信任，間接對其中心思想不認同。而且從李登輝到民進黨執政時期，提倡本土化、去中國化，將孫文思想視為「中國的」、「外來的」思想，不符合本土味，不具草根性，無法獲得民眾支持。黨國勢力衰退與政黨輪替，影響孫學研究的式微，實屬極明顯的事實，本文不須贅述。

（三）有些孫學研究流於知識僵固與缺乏創新

如果前兩項可歸因於外在的世界形勢變化與意識形態黃昏；或國內黨國勢力的衰退與政黨輪替的影響。則僵固與缺乏創新，必須歸諸孫學研究社群的責任，且應深刻反省與檢討。多年來孫學研究社群固然有不少學術菁英，發表創新思維的優秀論著，但也不乏故步自封，知識僵固，支離細碎，欠缺生機活力的現象，自然影響大眾及學術界的觀感，難以祛除對孫學研究「非學術性」的刻板印象。最令人憂心的是，許多大學院校各級教師升等的學術審查，對孫學研究也不太支持（不認為學術），使年輕研究者不願投入心力。

當代許多研究指出：一種學科要能持續發展甚至成長茁壯，必須不斷創新思考、跨域整合、交融互涉，才不至於僵固退化，這是複雜的結構與活動，也是變革的力量⁴⁰。孫學的性質原本就是最具科際整合、學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學術思想，但失去這種特色與學術創新，當然逐漸消沉。例如：民族主義能凝聚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的力量，孫中山說：「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民族主義第三講），而當代學者（Brubaker）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形式的公民宗教，民族主義取代了基督教所遺留下來的宗教空缺，提供現代國家維繫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

⁴⁰ Klein, J.T. (1996):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rgini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所必要的儀式和情感⁴¹。這是可以相互參考論述，甚至把政治與宗教互涉關係開展新見解。再舉一例說明，當代孫學研究當然會涉及兩岸與中國大陸，但除了過分貶抑或推崇中國特色之外，在學術研究上，能否客觀冷靜看待西方價值的普遍性與或中國特殊性，其背後都存在著西方和中國的文化脈絡與國家利益。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對外關係有歷史情境、文化內涵的特殊性，無法以現行的西方理論加以解釋；除了特殊性之外，隱含了中國道路的優越性，認為若接受中國價值觀的引導，則國際秩序將會別開生面，不同於近代以來因西方模式而產生的亂局。美國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指出：

「中國例外論」是文化式的（cultural），因「文化」本質上的獨特、殊異、分化傾向，並不會強行普及其價值；但中國例外論卻又是天朝思想、朝貢體系的產物，因此具有某種文化普遍主義的性格（Kissinger, 2011: xvi）。誠如周陽山所言：今後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不會選擇西方政體的既成模式，它會參酌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軌跡，走一條屬於自己的中國改革道路⁴²。至於臺灣方面，葛永光認為：三民主義舊的中間路線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現在面臨新的挑戰。只有臺灣自己找到這一條「新中間路線」（New Middle Way），才能凝聚共識，使全民共同為國家目標而奮鬥⁴³。換言之，孫學研究可以從現實政治體系中，思索普遍性與特殊性，而提出創新觀點。

伍、代結論：轉型與出路

本文探討「孫學研究的百年思索與半世紀浮沉」，思索孫中山逝世後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孫中山思想對中華民國，乃至未來兩岸關係的影響，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而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的孫學研究，曾出現兩波高潮，其主要的機構、團體乃至個人有何貢獻？具代表性的著作與出版有哪些？如果不趁現在還能蒐集、盤點，未來將更

⁴¹ Brubaker, Rogers (2015): *Grounds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⁴² 周陽山，〈孫中山的思想體系與理論架構〉，收入周陽山等著，《二十一世紀三民主義》，（臺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出版，2021年），頁34。

⁴³ 葛永光，〈二十一世紀是三民主義的世紀〉，收入周陽山等著，《二十一世紀三民主義》，（臺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出版，2021年），頁24-25。

為困難。第四節則歸納孫學研究式微的原因，包括：受到意識形態的黃昏與文化霸權的衰微；黨國力量衰退與政黨輪替；孫學社群的知識僵固與缺乏創新，必須思考今後的轉型與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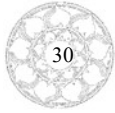
經由上述各節的論述，本文提出幾點孫學研究轉型與出路的思考方向，作為代結論。

首先，目前臺灣孫學研究面臨衰退的危機，是危機也可能是契機。因為兩岸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互信不生，共識難成，但孫中山思想卻是目前兩岸比較能共同接受的平台。一方面，從臺灣內部觀察，根據報載：臺灣民意基金會 2022.02.22 公布最新民調顯示，臺灣的藍、綠民眾七成對孫中山有好印象；該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認為，在臺灣這樣一個有嚴重國家認同分歧的地方，絕大多數人竟然對中華民國國父孫文有好印象，具有相當微妙的政治意涵。另一方面，大陸情形也頗微妙，近二、三十年臺灣幾個大學的「三民主義（中山）研究所」，紛紛更名、整併或消失，而大陸許多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卻新設孫中山研究所，並提供獎學金。大陸領導人如胡錦濤、習近平等，多次將改革開放政策與孫中山的實業計畫、建國大綱相連結⁴⁴，尤其近年的「一帶一路」，更與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實業計畫之精神有許多相通之處，所以中山思想在今後可以作為凝聚共識、搭建平台的契機。

其次，從本文第四節所述臺灣孫學研究三個組成系統觀察，大致上學院系統已經更名或整併，很難再回復，今後將寄希望於政府機構的「國立國父紀念館」和民間團體的「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等，不過這些機構或團體，仍需與學院的研究人力相結合，資源互補、相互支援，才能發揮更佳效果。

最後，學術研究典範，必須與時俱進，今後孫學研究不可故步自封，而需創新方法、學科互涉，進行有系統、持續性研究，並以累積性、實踐性強化其成果，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需有穩定的、充裕的實質支持！

⁴⁴ 周陽山，〈孫中山的思想體系與理論架構〉，收入周陽山等著，《二十一世紀民主主義》，（臺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出版，2021年），頁38。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中央月刊社 (1973),《淺說現代社會科學》,臺北中央月刊社出版。
- 王集叢 (1943),《三民主義文學論》,重慶初版,臺灣:帕米爾書店印行。
- 王萬鍾 (1944),《孫文學說疏證》,重慶初版。
- 吳相湘 (1984),《孫逸仙先生傳》(上/下冊),臺北:遠東圖書初版。
- 呂調陽 (1941), (1941)《民生主義經濟學》,桂林: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 李劍農 (1974),《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十版。
- 周世輔、周陽山, (1990),《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臺北:三民書局初版
- (1992),《中山思想新詮---民權主義與中華民國憲法》,臺北:三民書局初版
- 周佛海 (1928),《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本文引用的是在臺北的影印版,出版的時間及出版社不詳。
- 周陽山 (2021),〈孫中山的思想體系與理論架構〉,收入周陽山等著,《二十一世紀三民主義》,臺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出版,頁 28-78。
- 林桂園 (1947):《國父政治思想體系》,南京:現實出版社印行,初版。
- 邵 雍 (2021),〈評「中山先生與世界」系列叢書〉,載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孫學研究》,第 31 期,頁 155-172。
- 姜 琦 (1941),《三民主義哲學》,重慶:教育部訓委會出版。
- 洪墩謨主編 (1993),《外國學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論文目錄索引及摘要》,高雄:中山大學中山所發行。
- 胡漢民 (1928),《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臺北帕米爾書店 [1968],八版。
- 范 錡 (1929),《三民主義教育原理》,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 秦孝儀編輯 (1965),《蔣總統對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與融會貫通》,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
- 袁業裕 (1936),《民族主義原論》,南京:正中書局,初版。
- 高希均主編 (1973),《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店初版。
- 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 (1981),《憲政思潮季刊》第 56 期,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出版。
- 崔書琴 (1992),《三民主義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三次修訂版第二十二次印刷。
- 崔載陽 (1944),《三民主義哲學》,重慶:大道文化公司出版。
- 張作錦 (1989),〈真金不怕火煉! 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應當容許學生選修〉載《遠見雜誌》1989 年二月號。
- 張明貴譯 (1983), Frederick M. Watkins & Isaac Kramnick 合著《意識形態的時代:從 1750

- 到現代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
- 曹雷雨等譯(2000)，A.Gramsci 著：《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郭湛波（1936），《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 （1973），《近代中國思想史》（正、補合梓），香港：龍門書店再版。
- 陳水扁（2001），〈人民的力量勢不可擋〉，編入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所寫的序，頁 33-36。
- 傅啟學（1980），〈科學的三民主義〉，載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山學術論叢》第一期（創刊號），頁 1-26。
- 程天放主編（1965），《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臺北：正中書局初版。
- 葛永光（2021），〈二十一世紀是三民主義的世紀〉，收入周陽山等著，《二十一世紀三民主義》，臺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出版，頁 2-27。
- 鄒景雯（2001），《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臺北：印刻出版公司，初版 100 刷。
- 劉阿榮（1984），〈近六十年來三民主義學術研究之時代取向〉載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山學術論叢》第四期，頁 233-258。
- （1997），《三民主義社會變遷理念之建構及其發展》，臺北：國立編譯館，初版。
- （2002），〈近三十年來國內孫學研究之變遷〉，載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三十週年館慶特刊》，頁 90-103。
- 劉碧蓉（2016），〈臺灣孫學研究之回顧（1990-2015）：兼論國立國父紀念館之角色〉，載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孫學研究》，第 20 期，頁 17-42。
- 蔣中正（1935），〈國父遺教概要〉，引自《蔣總統集第一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1974〕，四版。
- （1939），〈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政程序〉，引自《蔣總統集第一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1974〕，四版。
- 戴季陶（1925），《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出版。
- 薩孟武（1929），《三民主義政治學》，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 藍順德（2010），《教科書意識形態—歷史回顧與實微分析》，臺北：華騰文化公司出版。
- 魏鏞（1971），〈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編入：《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一冊《社會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1-92。
- 羅剛（1942），《三民主義的體系與原理》，中央政治學校出版，本文引用〔1959〕台三版。

二、英文部分

- Brubaker, Rogers (2015): *Grounds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Kissinger, Henry. (2011):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Klein, J.T. (1996):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y and*



- Interdisciplinary . , Virginia :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Rejai , M. (1971) : Decline of Ideology ? Aldine, Atherton Inc. Chicago.
- Taylor, M. (2005).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 Sage Reference .

三、網路部分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2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簡介 ,
(https://www.rchss.sinica.edu.tw/jssp/page1/super_pages.php?ID=jsspintro , 引用日期
2022.03.23)
- 伍振鷺 (2000)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教育大辭書》,臺北:國家教育研究
院資訊網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2562/?index=9> , 引用日期2022.03.06)
- 曹添旺 (2008) ,〈追憶陳昭南院士〉,載《自由評論網》2008/11/26。([https://talk.ltn.com.tw
/article/paper/261156](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61156) , 引用日期2022.03.22)
- 維基百科 (2022a) ,〈鵝湖之會〉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5%9D%E6%B9%96%
E4%B9%8B%E6%9C%83](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5%9D%E6%B9%96%E4%B9%8B%E6%9C%83) , 引用日期2022.03.06)
- 維基百科 (2022b) ,〈文星書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98%9F%
E6%9B%B8%E5%BA%97](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98%9F%E6%9B%B8%E5%BA%97) , 引用日期2022.03.20)
- 蔣中正 (1969) ,〈革命歷史的啟示和革命責任的貫徹〉 對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揭幕典禮講詞。([http://www.ccf.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view=article&id=1559:0009-38&Itemid=256](http://www.ccf.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59:0009-38&Itemid=256) , 引用日期2022.03.16)

Sunology Research: A Century of Contemplation and Half a Century of Rise and Fall

Liu, A-Rong

Abstract

Dr. Sun Yat-Sen was an important thinker and a revolutio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ddition to advocating revolution and found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left behind a system of thought as a blueprint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As observed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s, the system of thought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e evolution of career development (1866–1925)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in “Sunology research” following Dr. Sun Yat-Sen’s passing. The so-called “century of Sunology research”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Sunology research” conducted over the nearly 100 years from the time of his passing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exclusive “party-state ideology” in the past to its gradual decline; Dr. Sun’s thought possesses important value in further contemplating the need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seek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in the future and a vision system that builds on the past and prepares for the future.

As for the “half a century of rise and fall in Sunology research”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paper, such phrasing refers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Sunology research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since the retrea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aiwan. Two waves of climax in Sunology research wer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the “centennial birthday of Dr. Sun Yat-Sen” in 1965; the 1970’s strengthening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periodicals. With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led on by a shift from authoritarianism that took place later, Sunology research gradually declined. The findings show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or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causes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Sunology research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three systems of Sunology research. They include: (1) The twilight of ideology and the decline of cultural hegemony; (2) The decline of party-state power and political party transitions of power; (3) Intellectual rigidity and lack of innovation. Finally, recommend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nd the way out of stagnation are proposed.

Keywords: Sunology Research, Ideology, the Centennial Birthday of Dr. Sun Yat-Sen, Institut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